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

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

——日本战后产业合理化政策研究

杨栋梁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俞辛焯 杨栋梁

编辑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中田 王家骅 王振锁 刘玉操

刘雨珍 米庆余 李 卓 谷 云

武安隆 赵德宇 高 宁 熊沛彪

薛敬孝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总序

世界已被称为“地球村”，各国、各民族的相互理解已成急务。日本为近邻，中日两国的交往不唯源远流长，且日渐密切。因而，研究日本、理解日本，更显重要。

早在60年代初，南开大学即已建立专门机构，开展日本研究。进入80年代，研究人员渐多，研究成果颇丰。1988年，又成立了综合研究日本历史、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哲学、语言、文学的学术机关——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推动学际研究、培养人才、多出成果，为提高我国日本研究的水平略尽绵薄，事其宗旨。公刊《南开日本研究丛书》，即为实现此宗旨。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刊行本研究中心成员的研究成果，以专著为主，亦包括少量日本研究名著的译作。遴选纳入丛书的著译，力求资料翔实、方法科学、立论新颖，具有开拓性。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由本中心主管刊行，并委托几位成员负责编务。纳入丛书作品的体例、观点等，皆由作者文责自负。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的刊行，幸获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在此顺致谢忱。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1998年3月

目 录

序 章	产业合理化研究的意义.....	(1)
一	市场、计划与政府.....	(1)
二	产业合理化本质分析.....	(5)
第一章	产业合理化政策的实施过程.....	(14)
第一节	战前的产业合理化.....	(14)
一	产业合理化政策的“引进”与“变形”.....	(14)
二	战前产业合理化政策的“遗产”.....	(21)
第二节	战后初期的日本经济.....	(29)
一	占领与改革.....	(29)
二	经济重建的诸矛盾.....	(33)
三	倾斜生产及其界限.....	(38)
第三节	产业合理化政策的制定.....	(44)
一	道奇“改革”与经济体制的“转轨”.....	(44)
二	产业合理化政策的出台.....	(49)
三	产业合理化的政策体系.....	(57)
第四节	战后产业合理化政策的实施过程.....	(65)
一	初期产业合理化的实态.....	(66)
二	“点”与“线”产业合理化的进展.....	(69)
三	产业合理化的全面展开.....	(76)
四	产业合理化政策向产业结构政策的转变.....	(80)

第二章 通产行政与合理化审议会.....	(85)
第一节 通产行政机构及其职能.....	(86)
一 经济安定总部的兴衰.....	(86)
二 “前线指挥部”通产省.....	(88)
三 “总后勤部”大藏省.....	(94)
第二节 产业合理化审议会.....	(99)
一 产合审的职能及其组织变动.....	(99)
二 产合审的审议活动.....	(103)
第三节 造船业合理化审议会.....	(109)
一 计划造船与“合理化”.....	(110)
二 造合审机构分析.....	(114)
三 造合审活动探微.....	(116)
第三章 合理化与“计划化”.....	(123)
第一节 “计划”思想的源流.....	(124)
一 从自由经济学到“混合经济论”.....	(124)
二 计划思想在日本的演进.....	(128)
第二节 长期经济计划.....	(135)
一 战后复兴时期的“影子”计划.....	(135)
二 高速增长前期的经济计划.....	(139)
第三节 产行业合理化计划与合理化法.....	(143)
一 概观：行业、业种合理化计划与合理化法.....	(144)
二 钢铁业的合理化计划.....	(149)
三 能源产业的合理化计划.....	(153)
四 海运造船业的合理化计划.....	(156)
五 石油化学工业的合理化计划.....	(158)
六 机电工业的合理化计划.....	(1 62)
第四章 合理化与外贸、外资、技术引进.....	(167)
第一节 合理化与对外贸易.....	(168)

一	外贸体制的建立.....	(168)
二	外汇配额制度的实施.....	(170)
三	贸易自由化与合理化.....	(174)
第二节	合理化时期的外资、技术引进.....	(179)
一	外资制度的特征.....	(179)
二	引进外资的实效.....	(182)
三	资本自由化的过程.....	(190)
第四节	附论：中日两国外资政策比较.....	(194)
一	对待直接投资的不同态度.....	(195)
二	外资优惠待遇.....	(197)
三	引资中的技术引进.....	(201)
四	引资与产业政策的结合度.....	(203)
五	执法力度问题.....	(206)
第五章	合理化与政策金融.....	(210)
第一节	财政投融资制度分析.....	(212)
一	财政投融资制度的形成.....	(212)
二	财政投融资的原资筹措.....	(215)
三	财政投融资的实施机构.....	(218)
第二节	财政投融资的实施及其特点.....	(222)
一	复兴金融公库的财政投融资活动.....	(222)
二	回头资金的财政投融资活动.....	(226)
三	开发银行的财政投融资活动.....	(229)
第三节	财政投融资作用评价.....	(232)
一	“小财政”与“大财投”.....	(232)
二	财政投融资与经济发展.....	(235)
三	财政投融资与经济稳定.....	(238)
第六章	合理化与政策税制.....	(242)
第一节	政策税制的形成及其结构.....	(244)

一	占领时期的税制改革.....	(244)
二	政策税制的形成.....	(248)
第二节	政策税制与企业资本积累.....	(253)
一	企业资产再评估.....	(253)
二	企业留保制度.....	(256)
第三节	政策税制与企业投资、生产活动.....	(260)
一	特别折旧制度.....	(260)
二	其他租税特别措施.....	(267)
第四节	政策税制的简要评述.....	(272)
第七章	合理化与产业组织政策.....	(275)
第一节	美国为日本设计的产业组织制度.....	(276)
一	战前日本产业组织的特征.....	(276)
二	美国对日本产业组织体制的改造.....	(279)
三	反垄断法的制定.....	(282)
第二节	日本型产业组织制度的构筑.....	(284)
一	日本朝野对反垄断政策的态度.....	(284)
二	日本政府对反垄断法的修改.....	(289)
第三节	产业组织政策的实施.....	(296)
一	个别产业组织立法与卡特尔限制的放宽.....	(297)
二	组织合并与企业集团的发展.....	(300)
第八章	合理化与企业经营.....	(307)
第一节	企业经营政策与经营观的变迁.....	(308)
一	从合理化到提高生产率运动.....	(308)
二	战后企业经营观念的变化.....	(311)
第二节	企业经营合理化的展开.....	(317)
一	企业经营合理化的一般性政策措施.....	(317)
二	中小企业经营合理化政策.....	(324)
三	企业经营合理化的成效.....	(327)

第三节	企业合理化与工人运动.....	(330)
一	合理化时期的劳动政策.....	(330)
二	工会对合理化的两种态度.....	(332)
三	工人阶级反对合理化的斗争.....	(334)

序 章 产业合理化研究的意义

一 市场、计划与政府

不久，人类将告别20世纪而跨入新纪元，我们这些即将“跨世纪”的人们应从本世纪的历史发展中学到哪些教示、以何种姿态迎接下个世纪的挑战呢？

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是本世纪的基本特征。本世纪初，业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呈现出种种衰兆。随着经济垄断、残酷剥削、失业、贫富两极分化、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帝国主义战争的频繁爆发，古典的以私有制为基础、自由放任为准则的市场经济破绽百出，及至1917年苏维埃革命成功和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人们已有理由相信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行将作为一种更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资本主义由盛转衰、社会主义从无到有蒸蒸日上的历史，如实地向世人展示了本世纪前50年的时代特征。然而，后50年来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对立和斗争的结果却是，本已呈现“垄断、腐朽、垂死”衰兆的资本主义迎来了新的“阳春”时代。而以东欧诸国的转向、苏联的解体为标志，社会主义的发展遇到巨大挫折，正在探索新的改革与发展之路。

这些惊天动地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呢？

社会主义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复生互为对方提供的深刻教示是：市场经济不能放任，“市场的失败”必须而且可能通过某种计划性的干预和调整来缓解；市场经济仍然是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有效形式，计划不应也不能取代市场。能否正确地对待和运用“计划”与“市场”，已成为一国社会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

二战后50年来的历史进程表明，西方各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教示，它们虽然继续坚持市场经济，但却放弃了“放任”原则；各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对国民经济进行有计划的干预，从而有效地调整了资源分配关系、缓和了劳资紧张状态，乘着战后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实现了经济上长期稳定发展和社会的相对安定。相比之下，曾经视市场经济如洪水猛兽的社会主义诸国，长期以来推行着以苏联为楷模的计划经济体制、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和高度集中的僵板做法，严重地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以至期望精神作用完全替代物质的作用，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在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竞争上不但长期处于劣势，而且进一步拉大了距离。结果我们在长期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制度上的优越性自赞自赏之后终于发现并坦率承认，罢黜市场、独尊计划的思想 and 做法何等愚蠢！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已到了社会主义如何接受资本主义教示的时候。

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人类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模式的长期实践中悟出一条真理：市场经济需要计划，计划不能代替市场，这就是当今得到广泛共识的所谓“混合经济”理念。尽管如此，在探究计划和市场如何“混合”等具体问题时，仍难免会引发出一场见仁见智的无休止争论。世界本来是多彩的，人文、历史的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世界上不可能采取某种单一的“混合经济模式”；而当我们对现存的各种经济体制逐一加以研讨时，就不会忽视战后经济发展的“优等生”日本及其经济体制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也正是我国的日本研究学界近年来热衷

探讨的问题之一。

早自60年代起，随着日本研究热的不断升温，有关日本型经济体制（或“模式”）的议论就已引起人们的关注。例如，1967年《伦敦经济学家》杂志 日本研究 专刊的文章中就已指出：“日本不是欧美式的自由经济体制，而是巧妙安排的计划经济。” 70年代美国商业部的调查报告则认为，在日本，存在着一种西方国家所无法想象而又难以模拟的官民合作关系。一时间，“日本股份公司论”名噪一时。进入80年代，美国学者C·约翰逊又提出日本经济“官主导”、“发展导向型”的观点，其著作《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几乎成为所有日本经济研究者的必读之作。再从近年美国的日本研究动向看，以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A·布莱因达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已经坦率承认，除“美国模式”外，现代社会还存在着其他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其中日本模式非但不是“异端”，而且“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尤其对原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日本模式更具有值得借鉴的魅力。另一方面，起初对欧美方面的观点普遍既感新奇、又存异议的日本学界，近年来也出现了诸种新的研究动向。例如，就战后日本的市场经济模式问题，村上泰亮的“被分割的竞争”说、樋渡展洋的“组织性市场经济”说、冈崎哲二等年轻经济学者们提出的“计划经济”说等等，已经在学界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我国，也可见到日本“管理型市场经济模式”、“公司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行政导向型市场经

高桥龟吉著：《战后日本经济跃进的根本原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页。

《经济学领域的“反古典革命”》，《参考消息》1993年3月12日第7版。

村上泰亮著：《新中间大众的时代》，中央公论社1984年，第103页。樋渡展洋著：《战后日本的市场与政治》，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第11页。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现代日本经济体系的源流》，日本经济新闻社1994年。

济”等提法。

然而，随着90年代以来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及其经济发展长期走不出低谷，人们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以致普遍认为日本经济及其经济体制已进入新的历史转折期。与此相关联，学术界出现的一个重大动向是，所谓的日本战后型经济体制有被全盘否定之势，甚至有一些曾津津乐道于“日本模式”的学者也忽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转而站在了批判“日本模式”的最前线。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是重新提出了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老问题。就目前的日本而言，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和赶超型“模式”之间，确实给人一种成年人穿旧童服的不协调感，“模式”更新在所难免。即便如此，却不说“模式”更新期正是国家权力作用大发挥的时期，就是进入新“模式”的运转期，国家权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不会消失，而只是形式、方法的改变而已。重要的一点是，对待“模式”也要坚持时空观，现时“失效”的“模式”不一定意味着其本来无效；现时存在的有效“模式”，也许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制约而不宜为他人直接效仿。

一般说来，在探讨一国的经济体制时，其目的不外是考察该体制是否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发展、稳定和分配公平等目标。同时，作为其次级研究，将涉及到该体制约束下的产业、贸易、财政、金融等中观性的经济领域，而中观领域的经济研究，往往更能深入揭示一国经济体制的运行特点，乃至提示最具操作性意义的借鉴。

本书将在把握日本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及其特征的基础上，对战后经济复兴和高速增长前期日本政府推行的产业政策——产业合理化进行历史的阐述，进而揭示国家权力在战后经济赶超中

马洪编：《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第300页；
左中海主编：《日本市场经济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所发挥的作用。这一选题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以往的研究普遍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日本成功地实施产业政策有关。然而，产业合理化作为日本战后连续推行15年的核心产业政策，迄今在我国尚未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有鉴于此，本书所作的这一尝试应该说是有意义的。

第二，产业合理化既是战后日本由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的体制转型期所推行的产业政策，也是其经济由战后复兴走向高速增长时期、即由经济后进国向经济发达国家跃进时期所推行的产业政策；因此，其政策制定的时代背景、目标及其操作方式、方法等等，对同样面临经济体制重建和经济赶超双重历史任务的我国经济建设具有极为现实的参考意义。

第三，本专题研究的意义还在于：不仅要通过实证研究阐明战后日本经济赶超过程中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发挥了什么作用，由以论证在日本战后型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而且要通过日本的例证说明，在现存的经济发展悬差、不完全竞争的世界市场及若干非经济因素的干扰等条件下，一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只能根据本国的实情和世界环境的大背景来制定日程表。特别是对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赶超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实现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或基本放弃了计划的干预之后，才能实现经济赶超。当前，在崇尚市场之风颇盛的情况下，这一理论性的结论或许有助于我们在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二 产业合理化本质分析

“合理化”一词本是个颇存争议的概念，尤其当它被作为一项“产业政策”推行时，不同的阶级、阶层曾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因此，在进入正文的考察之前，有必要就什么是合理化、产

业合理化的内容与实质是什么等基本问题，做一简要的历史追述和理论分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社会学家、行为理论奠基人马克斯·韦伯在他的诸多论述中，反复强调了如下一种观点：近代以前的社会是一种由亚洲式宗教统治的不合理的社会，而近代社会则是尊重科学与效率、法律与理论的社会，是按照客观主义和理性主义原则行事的合理的社会。他同时指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规，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在其他场合，韦伯还阐述了理性社会是官僚制社会、合理化即“近代化”的观点。

韦伯公然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辩护自不待言，但他的“理性行为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精神障碍”导致“经济行为”“阻滞”的论断却是切中时弊的。当时的欧洲大陆危机四伏，而德国正处在矛盾的火山口上。

尽管无从考察韦伯的“理性主义”、“合理化”论究竟对欧洲社会产生了多大影响，但是在一战结束后的20年代里，声势浩大的“产业合理化运动”却正是从韦伯的故乡德国率先兴起、进而由欧洲大陆推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1927年5月，国际联盟在日内瓦经济会议上形成如下决议，即合理化的内容为：以最小限度的劳动保证最大限度的劳动效率，产品的规格化和使用的简单化，避免浪费，物资分配简单化，减少物资流通成本；合理化的目标为：社会安定与生活提高，为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商品，使

马克思·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15页。

据认为，最先正式使用“合理化”一词并倡导“合理化运动”的，是一战后曾担任德国政府复兴部长和外交部长的Walther Rathenau。

生产者得到切实而公平的利益。这五项内容和三大目标曾被作为当时推进产业合理化的基本依循。在日本，正式“引进”并推行产业合理化政策是在滨口雄幸内阁上台的1929年，其后在不断升级的侵略中国及亚洲、太平洋战争期间，又曾在军部主导下搞起所谓“新产业合理化运动”。度过二战战败后的经济混乱期，日本政府于1948年老调重谈，再次把产业合理化运动作为产业政策的核心，并一直贯彻推行到60年代中期。仅从这一点看，要揭开战后日本经济复兴并迅速实现经济赶超的奥秘，也必须对产业合理化进行彻底的研究。

战前战后日本推行产业合理化的历史过程将在后文做详细考察，这里拟首先介绍一下代表统治阶级的官方和处于被统治阶级地位的劳动大众对产业合理化的认识与态度，然后对该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

战前日本的产业合理化政策，是在1927年金融危机后提出、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展开的。“市场的失败”与挽救危机，是当政者的共识与首要使命。当时，在负责推行产业合理化政策的商工省里，有两个后来都当上省次官的实力人物：一个是工务局长吉野信次，另一个是特许局事务官岸信介，他们在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吉野认为：“产业合理化不外是合理地经营产业。合理化即同科学，意味着按科学精神经营事业。……以往的科学管理法主要是面向私人的，而所谓产业合理化则是从国民经济的全局考虑。”而岸信介受政府派遣，专程到欧洲考察产业合理化的实施情况回国后，只强调了两条原则，即“否定自由竞争”和“降低成本”。

通商产业省编：《商工政策史》第9卷，商工政策史刊行会1961年，第4—5页。

通商产业省编：《商工政策史》第9卷，商工政策史刊行会1961年，第7—8页。

被官方视为产业合理化启蒙思想家的太田正孝观点更为明确，他在《资本主义的修正》一书中指出：“产业合理化意味着资本主义再不能像以往那样生产者和消费者恣意为”，“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绝路。……按照现在的资本主义方式走下去，已经得不到使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发展的力量”，“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资本主义的修正，别名合理化运动”。他同时强调说：“合理化运动的目标，就是对生产、流通和消费实行某种意义的统制。”

战后，在产业合理化政策出台前后以及政策实施过程中，有关议论从未间断；但较为全面地反映日本政府见解的，莫过于1957年通产省发表的《产业合理化白皮书》。

这份白皮书开宗明义地指出：日本经济在技术、设备、经营管理、产业布局和产业组织方面，都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产业结构上也存在许多矛盾，因此，“从根本上改善这种产业状况的过程，就叫做产业合理化。它既是企业努力的主体，也是政府战后产业政策的核心”。白皮书认为，产业合理化的基本点是，“企业以最小费用获取最大收益；从国民经济的观点出发，则在于最有效地利用一定的生产要素，最大限度地保持构成要素间的平衡及以此为基础的国民收入，追求经济上的合理性。”

关于产业合理化的基本内容，白皮书强调了以下四点：即企业内部的合理化，企业外部条件的合理化，行业的合理化以及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战前与战后的产业合理化是一个既联系又中断的历史过程。其连续性的侧面是：战前、战后两度推出产业合理化政策时，日本的经济都明显落后于欧美先进国家，这是当时最基本的国

中村静治：《日本生产率提高运动史》，劲草书房1958年，第30页。

通商产业省：《产业合理化白皮书——回顾与展望》，日刊工业新闻社1957年，第3—5页。

情，因此推行产业合理化实乃经济赶超之必须；既然“市场的失败”已使资本主义走到“绝路”，那就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修正”，产业合理化则是政府通过政策干预国民经济，进而“修正”资本主义的重要手段。这种政策干预的目标，不只在私人经济的效率化，而且要追求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平衡即合理化。

另一方面，与时代变化的大背景相联系，战前产业合理化与战后产业合理化的差异也是明显的，这表现在：战前推出该项政策时，政策当局具有很强的对国民经济加强计划和统制的思想意识，并且在实践上付诸实施，以致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全面地实现了对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统制。可以说，战前推行产业合理化的过程，也是日本经济急剧走向计划化、统制化的过程，是某种程度上否定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相比之下，战后产业合理化的政策思想中虽不能排除依然含有“计划”和“干预”的意识，但是其基本的政策指向却是缓和乃至废除经济统制，恢复市场经济，建立一种既非自由放任、亦非统制的，受一定的计划调整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产业发展秩序。再从政策内容和实施效果看，战前的产业合理化实际上把重点放在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手段的企业内部合理化和以企业合并、兼并为特征的产业组织合理化方面，而战后的产业合理化则强调技术革新和资本投入的重要性，并且把产业发展外部环境的改善、产业结构的调整等也作为重要内容。自不待言，其政策实施的力度和效果也是战前所无法比拟的。

与官方的宣传和主张相对照，战前各国的无产阶级对产业合理化曾采取了坚决反对或消极抵制态度。

当产业合理化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之时，当地进步工会组织即号召工人阶级予以抵制。共产国际则在1926年12月的第七次大会上做出决议，声明产业合理化“有助于资本改善其经济，